

【历史研究】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价值构建与逻辑表达

宋朝丽

摘要:慈善是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能够起到传递社会正能量、调节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在助力于探索中国近代慈善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义演可以作为价值构建,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观、慈善伦理、慈善表达方式,以及慈善义演的社会功能、动员机制,梳理出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和逻辑表达,为当代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慈善义演研究;慈善义演;慈善理念;慈善伦理;慈善表达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5-0133-04

在积贫积弱、灾难频发而政府乏力的近代中国,慈善在救济民众、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慈善义演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通过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不仅能够将中国慈善史研究向更深领域推进,也能拓展社会文化史和城市史的研究范畴。对近代慈善义演的研究,从“慈善内史”角度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但从“慈善外史”角度研究更有价值。^①研究近代慈善义演的社会功能、群体心理及背后的慈善伦理、慈善义演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价值形塑:中国现代慈善观念的形成与塑造

慈善价值观是慈善行为发生的基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会形成不同的慈善价值观,分析中国近现代慈善义演的思想蕴含,有助于发现中国慈善事业的演进脉络和发展规律。近代中国慈善义演发端于晚清,民国时达到繁荣,其最大特点是慈善主体的民间性和慈善目标的社会性。通过慈善义演研究,可以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慈善心理的文化衍变。

近代慈善义演有三个关键性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慈善义演价值观形成的标志。第一个事件是1876—1879年间的“丁戊奇荒”,慈善义演以义

赈的形式在当时的中国首次出现。上海鹤鸣戏园在《申报》发出声明,承诺“所得余银愿为山东赈款”^②。此后演戏筹赈风气在上海逐渐形成。时人认为演戏助赈使得“乐善好施者,借此既可娱目赏心”,又可“广积阴功”。^③此时,国人的慈善行为以赈灾为主,但媒体对其精神价值进行了提升,包含了提振中国精神和国民意识等更高层面的意义。^④

第二个事件是京津地区的“惠兴殉学”。清末新政时期,惠兴女士在杭州兴办女学,因借贷无果而服毒自尽,并留下遗书以唤醒世人对女学的重视。《北京女报》主笔张展云和梨园界名人田际云成立民间组织妇女匡学会^⑤,以惠兴的事迹排演新戏《惠兴女士传》,在湖广会馆演出,以演出所得资金邮寄给贞文女学堂。“自惠兴一死,北京女学逐渐发达”,“提倡女学风气大开”。^⑥京津地区义务戏演出筹款的目的主要是助学^⑦,标志着慈善义演取得新的进步。传统慈善的目的以养济为主,包括养老、育婴、施医、施药、赈灾等,救急不救穷,是消极的慈善,而兴办学校尤其是女学,则意味着慈善方式的变化,慈善救助开始关注提高民众的教育、文明程度和健康水平,拓宽了慈善事业的救助范围。

第三个事件是1906—1907年的“徐海水灾”。

收稿日期:2021-10-12

作者简介:宋朝丽,女,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黄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郑州 450044)。

在这次大水灾中,上海、北京首次为救灾筹款联合起来。与之前义演主要集中于戏园、参与群体主要是戏曲界艺人不同,此次义演涉及的范围和地域逐渐扩大,学生、商人、戏曲界及票友团体均展开广泛的募捐义演活动。^⑧从慈善价值观角度来看,慈善义演冲破地域和行业范围,救助全国范围内素不相识的民众,不再局限于熟人之间的互帮互助,说明现代慈善观念逐步形成,民众国民意识初步觉醒。

国人慈善价值观的重要转变是在抗战时期。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各地开展支援抗战的筹款运动。劳军义演、抗日义演、筹款义演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演艺形式包括举办义务戏、音乐会、话剧、游艺会、电影义映等,举办单位包括政府、学校、戏园等。所筹善款多用于购买战争物资、慰劳前方将士。如为援助 1936 年的“绥远抗战”,南开大学校友呼吁:“我们援助的办法,最好的当然是捐款了。”“南开校友们当然要尽一份国民的天职。”^⑨从当时各种报道可以看出,在民族危亡时刻,国人的慈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被充分激发,义演从“慈善救助”快速转向“民族公益”的大方向,彰显出参与者的民族大义和责任担当精神。^⑩

郭常英教授、岳鹏星博士新著《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中也提出中国近代是现代慈善义演的形成期,国人的慈善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结论对慈善义演研究提供了学术意义上的引导。近年来慈善义演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系统地慈善价值观的变化进行梳理的研究尚属空缺,晚清和民国时期是中国民众慈善价值观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对慈善价值观的研究能够厘清中国民众慈善心理微妙的演变历程。中国传统的慈善价值观以救济灾难、扶助弱小为主,体现了“恻隐之心”的民众心理和“天下大同”的社会愿望。晚清以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大慈善”观逐渐树立,这种慈善观更加重视慈善的公益属性,注重慈善在造福社会、塑造民族爱国精神方面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现代特有的慈善价值观,即日常慈善源自仁爱恻隐之心,多表现为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甚至学缘的互帮互助,而一旦发生洪水地震等重大灾情或者国家面临外来危机,人们心底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很容易被激发,具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对近代慈善义演在价值观形塑方面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可以更清楚慈善义演的价值形成过程。

同样,也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到慈善的价值并不在于捐了多少钱,而在于对和谐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友爱互助精神的传播。人们从事慈善的功利心在减少,不再是积德行善以求来世回报,而是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二、慈善伦理:寓善于乐与寓教于演的联结

慈善义演的核心在于行善^⑪,如何正确行善,则涉及慈善伦理问题。慈善伦理“既规定着慈善如何向我们走来,也规范着我们如何进行慈善”^⑫。受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影响,近代中国的慈善伦理体现为“寓善于乐”和“寓教于演”^⑬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了近代慈善义演事业的发展繁荣。

“寓善于乐”是慈善组织方通过举办义务戏、游艺会、电影等,在满足人们精神娱乐需求的同时筹款募捐,达到慈善救助的目的。这种方式受到当时民众的高度认可,如 1885 年 11 月,华商颜永京、吴虹玉在上海用幻灯机自演影戏助赈,时人评价此次义演“于赏玩之中寓赈恤之意”^⑭。到 1907 年“江皖水灾”时,慈善义演已经融会了多种艺术门类,演变出多种演艺形式,观众“既可遣其雅兴,复得遂其善心”^⑮。“寓善于乐”在当时慈善氛围没有普遍形成的情况下,是吸引民众参与慈善的有效方式,也体现了慈善公平自愿的伦理观念。自愿原则是慈善的首要伦理原则,慈善行为的发生首先建立在对施善主体的尊重上,不能忽视施善者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意愿,那种以价值强加、道德绑架等方式强迫他人捐赠的行为是不符合慈善伦理的。

“寓教于演”是在慈善义演中,通过内容设计激发民众的悲悯之心和爱国主义情怀。灾情戏是慈善义演的主题,通过“灾荒与苦难”的渲染,催发民众慈善意识和慈善情怀,形成慈善氛围。在全面抗战时期,慈善义演“寓教于演”的特征表现更为突出,如 1938 年重庆话剧界编制《逃难到四川》《自强》《女英锄奸》等话剧,对动员民众奋起抗日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夏衍新剧《一年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士气。^⑯“寓教于演”形式使得慈善义演起到引导社会正能量、弘扬社会新风尚的作用。对这一特点的总结归纳,也是慈善义演研究价值的体现。

当然,近代慈善义演还有很多不符合伦理规范的地方。如《中国慈善义演研究》中探讨了近代上

海青帮以举办慈善义演作为漂白其罪行、树立其形象的工具等事例。这些弊端给中国慈善事业带来警示:一是要避免慈善工具化,避免慈善沦为某些个人或企业谋取利益、形象和声望的工具;二是要避免把慈善商品化;三是要避免强势慈善、暴力慈善。这些弊端都不利于从内到外地激发民众的慈善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场域”效应:时尚引领与文化风尚的形成

义演作为慈善的传播方式,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时风气之先,在于用当时民众最能够接受的、最新潮的宣传方式,满足了民众的文化需求,在全社会引领时尚,形成慈善文化的“场域”效应。正如《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指出的:“民众对义演娱乐的追求,是人们对文化生活有需求的表现。”“观众购票观演,表明愿意接受组织者的筹款诉求和方式,这是该时期慈善义演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因素。”^{①7}

慈善游艺会主要包括文艺演出、猜灯谜、舞会等,由于举办门槛较低,又是当时社会较为流行的社交方式,迅速成为慈善义演的主流方式。慈善音乐会是民国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受到社会民众和学生群体的普遍欢迎,影戏也颇受市民喜爱,“种种新奇迥非昔比,座上诸客无不击节称赏”^{①8}。慈善杂技、体育竞赛、音乐义赛等也都受到民众的追捧。

近代慈善义演的这种“场域”效应,说明慈善义演要形成长久的生命力,需注重形式创新,用普通民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慈善。民国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东也闹着演剧筹款,西也嚷着募捐演剧,这个声浪和空气,几充满了内地”^{①9}的社会文化现象,正是因为慈善事业的旧有模式被打破,出现了“慈善义演”这一新型慈善表达方式。

四、功能整合:慈善义演的内在效用和外延影响

近代慈善义演是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产物^{②0},需要对其社会价值从内在效用和外延影响方面进行分析。郭常英教授认为,近代慈善义演的内在效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慈善方式的多样化。慈善义演一方面扩大了慈善事业的经费来源,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群体、艺人团体、政府机构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与沟通。二是形塑了社会“娱善文化”。“寓善于乐”

是慈善义演的显著标志,通过娱乐助赈的方式,吸引广大民众参与慈善活动,在当时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不高、民众慈善意识不强的情况下,这是最合适的慈善方式。如1921年江苏水灾义赈中,“其入场券每张收资大洋一元,借为助赈之用。想善男信女,必能各解义囊,借娱乐之机会,行救灾之宏愿也”^{②1}。在慈善义演中,各地同乡会、社会名流、政界人物及其家眷往往是组织者,艺界名角、电影明星、学校师生是表演者和推动者,购买义演票券的广大社会群体则是义演的捐助者和支撑者,政府机构则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通过慈善义演,将政府、社会名流、艺界、学界、广大民众等并无交集的不同群体组织在一起,对培育民众的慈善意识,营造全社会慈善风尚起着重要促进作用。

近代慈善义演的外延影响体现在弥补国家社会救助短板和促进民族认同两个方面。首先,慈善义演有效地发挥了安抚社会弱势群体、救助普通民众、抚平战争创伤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其次,慈善义演培育了社群认同和民族认同。在慈善义演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出于社会救助的需要参与慈善活动,在彼此合作中逐渐形成价值认同,有助于改善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如社会阶层较低的戏曲界,由于在慈善义演中表现出色,受到社会民众的一致赞许,提升了社会地位。而在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时,慈善义演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观念通过艺术的形式向社会民众传播,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可以说,慈善义演在当时培育和塑造了民众的爱国意识,增加了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

近代慈善义演承担起了时代和民族发展的社会责任,跳出了救灾救难的“小慈善”圈子,将慈善义演作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形成了“大慈善”的氛围。对于这一规律的研究和总结,能够使慈善事业在中国民众认知中的价值度得到提升,也将慈善义演研究升华到了国家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新高度,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五、慈善动力:慈善社会动员机制的构建

晚清和民国时期,社会力量在近代慈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中国各类新型民间社团纷纷兴起,有如下几个类别:一是商会、商团、同业公会;^{②2}二是民间慈善团体^{②3};三是同乡会组织^{②4};四是各类学校及校内社团,以较大城市的教育

机构及部分教会学校为主;五是各类艺人社团,如戏剧班社、票友票社、体育社团、新式艺人团体等;六是其他民间团体,如各种妇女社团、青年社团、教会组织、媒体等团体机构。在这些社会团体的推动下,慈善义演将演艺界、绅商、学界、医院、社会精英等纷纷纳入慈善行列,在全社会形成了慈善合力。若将义演的表演者、捐助者等非政府人员也视为广义的社会力量,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通过慈善义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网络。《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对这一时期慈善民间社团的梳理,明晰了近代慈善义演的整体脉络,加深了学界对近代慈善义演的认识:社会力量是近代慈善义演产生、发展和嬗变的主要推动力,无论是慈善义演的活动组织,还是慈善思想的宣传,社会力量都起着关键性作用。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忽视对社会力量慈善意识的培育。

近代慈善义演的作用机制在于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让社会各阶层民众找到在社会网络中的身份认同感、成就实现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慈善义演中,社会精英的形象得以塑造,行业组织的互助功能得以彰显,艺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感得以彰显,民众的积善行德观念得以实现,才有了社会慈善氛围的整体提升。这一研究结论充分说明,慈善事业的根基在民众,让民众有机会参与慈善事业中,并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是慈善事业发展繁荣的关键。

六、结语

将慈善义演作为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的载体,从城市发展史和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具有开拓性的重要价值。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多注重慈善义

演所体现的思想,并未将慈善义演作为思想的载体,从而观察慈善义演在思想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慈善史研究则缺乏针对慈善义演的专题性系统探究。将慈善义演研究与城市发展历程、文化娱乐形态、社会文明进程等结合起来,能够拓宽研究思路,挖掘更多新议题,带来更深层次的启迪,突破现有慈善史研究的瓶颈,实现新的学术增长。

注释

- ①⑦⑧⑩⑪⑬⑯⑰⑱郭常英、岳鹏星:《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36、37、110、315、84—85、298页。②《戏资赈饥》,《申报》1877年4月26日。③《梨园助赈》,《申报》1887年12月11日。④李爱勇、岳鹏星:《演戏助赈: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音乐传播》2017年第2期。⑤《记妇女匡学会》,《大公报》(天津版)1906年3月24日。⑥《女学发达》,《大公报》(天津版)1906年4月3日。⑨《南开校友筹款援豫,国剧节目极精彩》,《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11月26日。⑫张登皓:《慈善歧视及其治理》,《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⑬本文所论“寓教于演”中的“演”指慈善义演,包括传统义务戏、慈善游艺会、慈善音乐会、传统说书、杂耍、体育赛事、电影等形式,是多种娱乐类型的综合体。⑭《观影戏续记》,《申报》1885年12月7日。⑮《公益善会李公祠开演电影、新戏助赈启》,《大公报》(天津)1907年2月6日。⑯陈洁、陈天白编著:《重拾历史的碎片:中国艺术界抗战备忘录(1931—1945)》,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⑰《观影戏记》,《申报》1875年3月26日。⑱《天迟我生逆耳谈·慈善界教育界之演剧筹款谈》,《晨钟》1924年第3期。⑲《同济医工賑灾热,为善最乐》,《申报》1921年11月28日。⑳朱英:《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㉑郭彦军:《近代上海社团发展及其社会管理意义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㉒杜克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责任编辑:何 参

Value Construction and Logical Expression of Modern Chinese Charity Performance

Song Chaoli

Abstract: Charity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harmony. It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ransmitting social positive energy and regulating social resources. The research on charity performance in modern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rity in modern China. The charity performance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can be used as a value construction to outline the concept of charity, charity ethics and charity expression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charity performance,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logic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charity history, and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hilanthropy.

Key words: research on charity performance; charity performance; charity concept; charity ethics; charity expression